

谨防贫困边缘户“因疫致贫”

□□ 郭君平 李思经 刘合光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引发关注讨论。这“6亿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属于贫困边缘群体。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这要求我们在减少贫困存量的同时,一定要严防贫困增量,尤其是要严防贫困边缘户“因疫致贫”。

加强贫困边缘户帮扶是减少新生贫困、巩固脱贫成果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贫困边缘户致贫风险较高。由于生计资本薄弱、可行能力不足或缺失,贫困边缘户兼具明显的弱质性、摇摆性特征,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增收致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容易成为新生贫困的高发群体。另一方面,贫困边缘户群体规模大。据国务院扶贫办摸底测算,2019年底约有300万贫困边缘人口。

加强贫困边缘户帮扶是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贫困边缘户生计状况的脆弱性与贫困户相近,但两者享受到的政策福利有一定的差距,以致出现“悬崖效应”和“福利陷阱”。若这种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长期不疏导消除,不仅会诱发群体相对剥夺感,还可能激化贫困边缘户与贫困户、一线扶贫干部等群体之间的矛盾,造成乡村社会生态侵蚀、基层治理风险加剧、党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危害,甚至有可能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贫困边缘户帮扶是预防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抓手。2020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有可能会让部分贫困边缘户坠入贫困户之列,进而诱发新增贫困人口规模扩大的风险。为将贫困边缘户致贫风险化解在萌芽和初始阶段,或阻遏小风险、个别风险酿成大火风险、综合性风险,地方政府须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细化工作做法,尽快建立补差型、平衡型帮扶机制,着力提升贫困边缘户抗疫能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扶贫将开启战略性改革:一是政策导向由“事后减贫”向“事前预警、事中帮扶”(从“防”上下功夫)转变,二是工作重点和难点从消除显性的原发性绝对贫困向解决隐性的次生性相对贫困转变。在此新形势、新背景下,贫困边缘户将随之成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缓解相对贫困机制的重点瞄准群体之一。

决战时刻,应有非常之举;遭遇疫情,当有防贫之策。如此,方可蹄疾步稳,持续提升脱贫质量和成色。突如其来的疫情有可能会让部分贫困边缘户坠入贫困户之列,进而诱发新增贫困人口规模扩大的风险。为将贫困边缘户致贫风险化解在萌芽和初始阶段,或阻遏小风险、个别风险酿成大火风险、综合性风险,地方政府须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细化工作做法,尽快建立补差型、平衡型帮扶机制,着力提升贫困边缘户抗疫能力。

第一,线上调查、线下走访双管齐下,强化摸底排查。组建县、乡两级干部调查

小组,对有致贫风险的贫困边缘户开展“线上线下”精细摸底排查。“线上”,依据教育、医保、住建、民政等部门数据信息,找出因“疫”存在致贫风险的贫困边缘户疑似名单。“线下”,由驻村工作队员组织村“两委”干部,对照贫困边缘户的判定标准进入户调查核实。如此两相结合,针对排查确定的初步名单及相关致贫情况进行比对,然后将其中致贫风险较高的贫困边缘户名单列示出来,由乡镇开会审议后报县级审定。

第二,稳定嵌入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强化产业带动。始终将产业发展作为持续增收的突破口,在充分尊重贫困边缘户自主选择项目并综合考虑劳动力、产业技术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带贫机制,因地制宜选择“企业+基地+贫困边缘户”“企业+合作社+贫困边缘户”“政府+企业(合作社)+贫困边缘户”等不同模式,尽可能将更多贫困边缘户人口稳定地嵌入产业链和价值链,助其远离“贫困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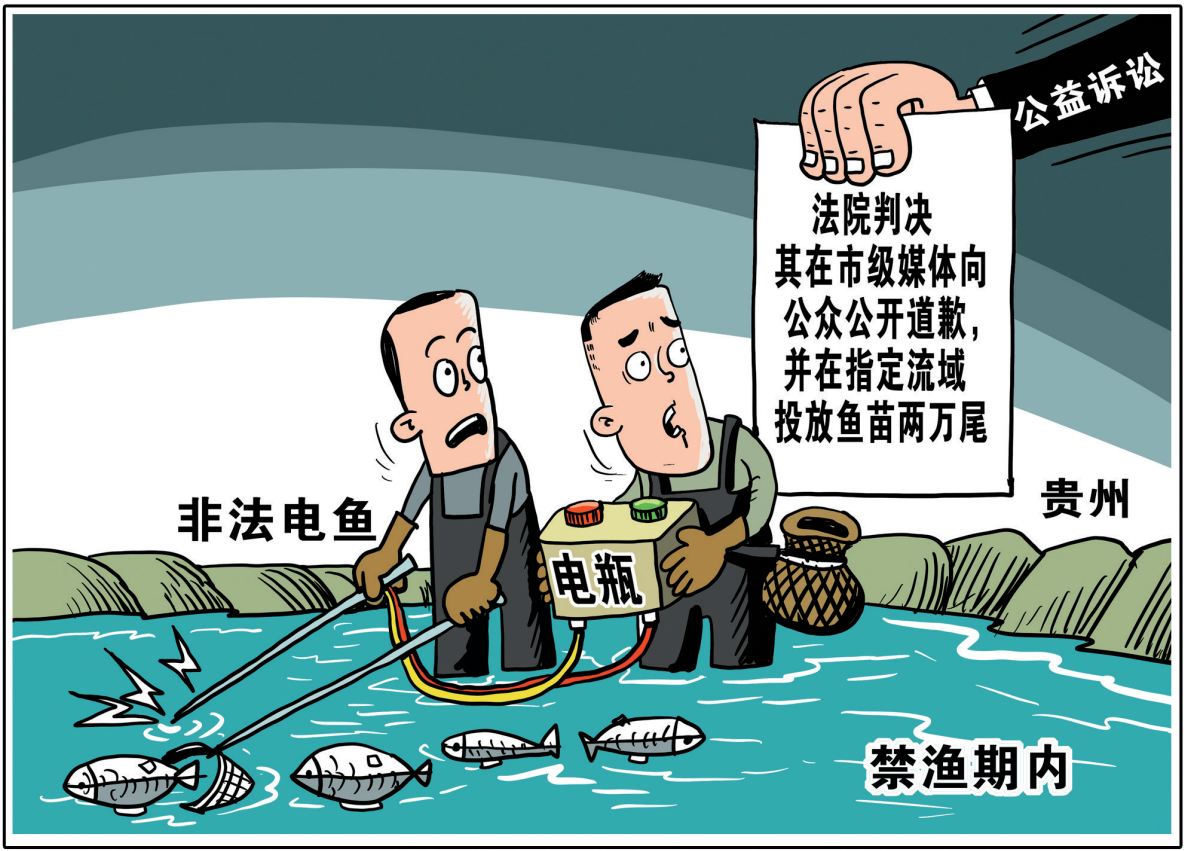
第三,就地设岗、外出返岗双轮驱动,

强化就业帮扶。一方面,积极开发村级临时性公益岗位的同时,发动本地龙头企业、合作社、扶贫车间等设立非固定性岗位,让滞留在村的贫困边缘劳动力就近就业。另一方面,通过落实差异化的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或“点对点”“门对门”一站式送达等方式,组织帮助贫困边缘户劳动力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第四,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与产品类型,强化金融支持。一是放宽信贷限制,对于申请扶贫小额信贷的贫困边缘户,允许其与贫困户同等享受政府贴息、贷款期限、基准利率等优惠政策,以满足其恢复生产的资金需求。二是打造特色农险、指数保险、人身意外险等一揽子全方位保险扶贫方案,覆盖人、财、物等诸多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从源头筑牢贫困边缘户致贫的“防火墙”。

第五,坚持“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强化兜底保障。防疫常态化之下,对有特殊性、突发性、紧迫性困难且符合兜底保障条件的贫困边缘户,应实行全流程网上办理,简化申请材料,优化工作流程,缩短审查周期,通过网上信息核对、电话求证等方式核查其经济状况,并及时将这类群体纳入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性政策的覆盖范围,切实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托住“救急解难”的底线。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绘图:朱慧卿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据媒体近日报道,张某某等人在禁渔期内,到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采用电击的方式非法捕捞野生鱼160条,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认定两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水生生物资源和水体生态环境,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修复生态的责任,遂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判决两人在市级媒体向公众公开道歉,并在指定流域投放鱼苗2万尾。

这正是:

禁渔期内去捕捞,电击得鱼百多条。
投放鱼苗加道歉,如此判决当叫好。

文 @十八刀

精准扶贫要多些“点石成金”之举

□□ 江武

闽南大山深处德化县英山村,10年前还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全村100多户贫困户、低保户,村民住的都是低矮、破旧的土坯瓦房。村民贫穷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产业,赚钱主要依靠外出打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穷山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是因为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把产业发展起来了。他们选择的产业,是一个在当地有着数百年种植历史的“寸金薯”。

同样的产业,为什么过去很长时间都不能给群众带来好的收益,而现在却成了群众眼中的“金娃娃”。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群众只把它当作一种蔬菜种植,主要用于自食,种植规模小,知名度很低。现在是把“寸金薯”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近年来,先后有7名科技特派员来到村里,推广无公害栽培、浅槽种植等技术,从选土、整地、种薯处理、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手把手指导村民,“寸金薯”的品相大大提升,亩产翻了一倍,价格也逐年上涨,村民的日子一年好过一年。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发展可谓重中之重,而如何选择产业,考验着广大帮扶干部的智慧和担当。只有走村入户,深入群众,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根据贫困村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才能为一方群众选准有市场前景的脱贫产业,助力当地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有着数不胜数的地方名优特产,有些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脱贫攻坚中,各地要多一些“点石成金”之举,让它们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助推剂”。

家长陪伴缺失是农村教育的主要问题吗？

□□ 巩淑云



近日,各地纷纷开始复学,很多家长感慨“神兽”终于归笼了。开学可以让学生逃离手机等电子设备,把大部分教育时间“归还”给学校,也让老人们能歇一口气,这是让家长们欣慰的地方。然而很多家长表示,他们并没有因此获得解放,因为家庭作业辅导还要继续,家长被“逼疯”的一幕幕还在上演。不过,在教育中,无论是手机问题,还是家庭作业辅导,农村孩子都因为家长陪伴缺失而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

农村教育中家长陪伴的缺失带来的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只不过疫情防控期间,这个问题集中地暴露出来。表现之一经常提到的硬件的缺乏。由于父母要外出务工,一些孩子没有智能手机上网课。据一位老师反映,在网课直播中,多数班级五十几名学生中仅不到半数学生在线听课,上交作业的学生更是个位

数。虽然农村网课情况不是很理想,但是这种网课在线率还是令人意外和担忧的。另一种情况是家里会留一部智能手机或者用老人的手机,孩子会在老人的监督下,自己接收通知、上网课、上传作业等。但是孩子自制能力差、老人也管不了,所以往往抵挡不住手机的诱惑,会在网课前后打着上网课之名,行玩手机之实。

但是,也不能就此一味批判农村家长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席。近几年,经常会有家长被辅导作业困扰的新闻和段子出现。这是近些年才有的新问题,即家长在孩子学习尤其是儿童学习中需要或者被迫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网友说:“小时候,我在写作业,我妈在看电视。20年后,我还在写作业,我妈还在看电视。”的确,知识改变命运,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孩子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家长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但是,这种“20年后,我还在写作业”的情况是最近几年被突出强调的亲子陪伴和教育带来的后果之一。

亲子陪伴固然重要,但是过度强调会将社会责任转嫁到个体家庭中,也会

忽略隔代抚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有的家长也在辅导孩子过程中“怨声载道”,因为孩子的作业都需要家长检查,甚至很多问题都需要家长去教,有些家长甚至怀疑老师是否可以从业中判断孩子对知识的认知程度。但是为了孩子,家长往往处于弱势,会对老师“敢怒不敢言”。而且,如果将家长陪伴放到学校教育至高的位置上,不仅加重家长的负担,甚至会适得其反,反而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正如网友说的,“不写作业父/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种过度强调,对家长来说,会增加农村家长的物质负担和精神焦虑;对孩子来说,也会使其因为家长的缺席而拉开差距。

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这个共同责任中,过度强调家长责任,就会弱化社会责任,也会把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视为家长陪伴缺失的问题,从而掩盖了教育逐渐“去社会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教育“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教育的共同责任过多让渡到家庭中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教育的负担逐渐落到父母身上,父母负担不了的就交给老人、交到市

场化的机构中。

当下,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资源配置问题凸显、上升渠道紧缩等变化,教育已进入拼时间、拼资本的“拼爹”“拼妈”时代。然而,很多农村孩子的父母却没时间、资本不能两全,他们要外出务工才有可能为孩子创造教育资本。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现实矛盾,一边是对亲子陪伴的过度强调,另一边是父母背井离乡的身不由己。所以家长陪伴缺失不是农村孩子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家长为什么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孩子才是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也不仅是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经常谈到的呼吁教育资源公平分配,针对的仅仅是教育领域。同样,我们在试图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也不应该只呼吁家长陪伴,还应该去分析为什么那么多农村人无法就地、就近满足生活需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下很难解决,但是至少应该在教育领域让教育社会化,让全社会共同承担起教育的责任。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发:nmrboinolun@163.com

征稿启事

审计监督助力保护农民工“血汗钱”

□□ 郑茂霞 孙现富

今年5月,我国第一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根治欠薪问题、筑牢民生底线的重大举措。根据《条例》要求,审计机关按照职责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资金情况进行监督。

深刻分析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除了农民工法治意识淡薄、处于弱势地位等自身因素外,工程建设领域管理不规范、行政主管部门履职不到位以及其他部门单位主动作为不够是重要症结。其实,这些领域和事项都在审计监督范围之内。

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常态化“经济体检”任务,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上优势独特、大有可为。一方面,能循着欠薪问题抽丝剥茧、层层追溯,从多个层面切入,多个视角分析,可打破部门间壁垒,直至找到“病灶”、除去“病根”;另一方面,又能坚持问题导向,综合分析资金拨付、工程管理、金融、政策执行等各方面信息资源,提前研判和预警“欠薪风险源”,提高抗风险和化解危机能力。

要坚持科学工作方法,精准发力,务求实效。依托经济责任审计、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聚焦权力运行和责任落

实,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列入审计内容,重点监督检查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协调、管理指导职责落实情况,是不是依法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着力监督检查行业监管部门是不是履行监管责任,严格督办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拖欠工程款等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严格监督检查执法机关是不是及时受理、督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是不是依法处置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提高监督系统性针对性。

要加快审计技术手段方式方法革新,加强非现场审计,问题线索核查、监控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加强同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等力量的联动协同,提高审计监督质量和效益,切实做到审计发力大一点、拖欠农民工工资少一点。对“踢皮球”、不担当、不作为,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谋私、失职渎职等行为,查深查透查实,严厉惩戒问责,压实整改责任,绝不能屡审屡犯。

要推动标本兼治,加大审计结果公告,曝光突出问题,剖析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机制性缺陷、制度性漏洞,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发现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推动从源头上预防风险,从制度上弥补漏洞,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作用,还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的朗朗乾坤。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应避免什么误区？

□□ 柯炳生



近年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新的热点。这对于强化区域优势,促进优质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不过,也有一些误区,尤其是在名称方面。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称上的主要误区,是品牌名称很美,但含义不清晰。

例如,有几个地方,由市一级政府出面推动,试图打造出一个用于全市区域所有农产品或者很多种农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所用的品牌名称由四个字构成,看起来很美,富于诗情画意,还配有一个很有艺术特色的标识图案。可是,先看名称,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农产品区域品牌,而更像一个旅游业的广告。听说,有更多的地方政府,也想按这种方式,仿效之。

名称含义不清晰,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对农产品区域品牌规律的忽视。

品牌是什么?品牌就是产品质量的概括表达。工业产品以及一些深加工农产品,是通过企业品牌来代表其产品的质量;不同的企业中,技术不同、管理不同,导致其产品的质量也不同。而初级农产品和初加工农产品,尤其是其中的植物性产品(水果、蔬菜、大米、面粉等),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所在区域的自然条件,包括温度、光照、湿度、土壤等。因此,这些产品的区域品牌影响力很大,而很难找到有名的企业品牌。例如,谈到优质大米时,人们会想到“五常大米”等区域公用品牌,而不会记得有哪个企业品牌。

农产品质量与种植区域的关系是:一种农产品,只有在特定的区域内种植出来的,质量才是最好的;某个区域,能够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有很多种,但是质量最佳的产品,只能是若干种,而不可能是所有的产品。因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通用命名格式“产地名+产品名”,含义非常清晰,信息非常明确,这个地方生产的这种产品,质量优异。

而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区域品牌名称,只包含(或隐含)了地点,而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种植物。当地决策者的本意,是想用这样一个品牌,来囊括区域内的所有农产品。所要表达的含义是: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美丽,我们这个地方的所有农产品,都特别棒,都是顶尖质量!

这种方式的区域公用品牌,无论名称中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无论用多少投入和多长时间推广,都不大可能让消费者相信,这个地方随便种什么农产品,都是顶尖质量的。最终能够让消费者和经营者认可的信息,也就只有一个:这是这个地方出产的产品。人们也还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很可能留下的印象是:这个地方没有质量特别优异的产品,而是所有产品,都很一般。这样的区域公用品牌,也不可能有品牌溢价效应。市场上,听说过有假冒“五常大米”或“西湖龙井”等品牌的,而没有听说有假冒上述名称优美区域品牌的。

也有人说,上述区域公用品牌,强调的是“绿色、生态、安全、健康”。即便如此,也仅仅是产地环境的安全性,而不是产品本身的安全性。产品本身的安全性,除了产地环境的安全,还需要生产过程严格符合国家的要求,否则,无论产地如何安全,最终产品也会有不安全的风险。而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可以打上“绿色、生态、安全、健康”的标签。

在有关讨论中,也有人提出要自定一套区域公用品牌的安全性标准。农产品的安全性标准,国家已经有一整套了。例如,有关产地环境标准和生产过程标准的认证,已经有了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开始试行普遍性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这是直接针对农产品本身安全性的制度,意义更直接、更突出、更有普遍性。一个地方政府要另搞一套,既没有必要,也无法做到。

此外,有些区域公用品牌的名称,也有食古不化现象。例如,茶叶中的毛尖茶,含义一目了然,区域公用品牌比较有名的,有“都匀毛尖”等。据说,历史上,不叫毛尖茶,而叫“鱼钩”“雀舌”,说是作为贡品,皇帝喝了说好,觉得形状如雀舌、鱼钩而赐名。其实,无论是雀舌还是鱼钩,与茶叶联系在一起,都没有什么美感。都匀市做得好,区域公用品牌名称中,采用了毛尖而不是雀舌或鱼钩。但确实有的地方,用的区域公用品牌名称是XX(地名)雀舌。

又如,福建省平和县盛产蜜柚,很多年前申请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称,为“平和琯溪蜜柚”。其中的琯溪,并不是植物品种名,而是古时候一条小溪的名称。现在这条小溪早就没了,成为平和县城了。区域品牌中的“琯溪”两个字,没有实际意义,而只会让消费者认知困难,记忆困难,应该去掉。

有了区域公用品牌之后,还要维护和使用好。四川会理县的石榴质量很好,软籽,不用吐籽,也有“会理石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但是,前些年,收购商使用的包装箱,全印着“突尼斯石榴”的字样;在北京的超市里的标签,也是这样,让人误以为是突尼斯进口的。而实际上,只是因为多少年前的品种来源地是突尼斯。去年,会理县专门下了文件,才改成了“会理石榴”的标识。